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

(增订本)

〔日本〕 依田 家 著
卞 立 强 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本书根据日本 溪书舍 1989 年版译出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
(增订本)

〔日本〕依田 家 著

卞 立 强 译

责任编辑:张文定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74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一版 199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301-01477-5/ K·107

定价:4.80 元

目 次

关于亚洲近代化的笔记(代序)	(1)
一 前言	(1)
二 亚洲近代化变革的形态——太平天国革命与 明治维新	(4)
三 明治维新	(10)
四 自由民权运动	(12)
五 战前天皇制的本质	(16)
 19 世纪后半期日中两国的近代化	(19)
前言——国内统一市场问题	(19)
一 统治体制与人民斗争	(22)
1 统治体制	(22)
2 科举与世袭制	(26)
3 有藩与无藩	(28)
4 人民斗争	(29)
二 两国的思想状况	(32)
1 朱子学世界观的瓦解	(32)
2 西洋学与对外意识的问题	(35)
3 攘夷思想与华夷思想	(43)
三 两国近代化的经济过程	(46)
1 两国的买办问题	(46)

2 官督商办	(49)
结束语	(55)

19 世纪 50 ~ 60 年代日中两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59)

前言	(59)
----------	------

一 日中两国对西欧国家制度的介绍 (60)

1 日本对西欧国家制度的介绍	(60)
----------------------	------

2 中国对欧美国家制度的介绍	(62)
----------------------	------

二 幕府末期对欧美制度的实际见闻 (65)

三 欧美制度对日中两国的影响 (68)

四 争取统一国家的制度改革论 (72)

1 公武合体论	(72)
---------------	------

2 以“大政奉还”为前提的统一国家论	(75)
--------------------------	------

3 以幕府为中心的統一国家论	(79)
----------------------	------

五 明治新政权的成立 (85)

结束语	(88)
-----------	------

19 世纪末日中两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90)

前言	(90)
----------	------

一 作为出发点的《政体书》 (92)

1 《政体书》的本质——作为各藩联合体的统一	(92)
------------------------------	------

2 废藩与统一国家的完成	(94)
--------------------	------

二 废藩置县后绝对主义体制的动摇与对近代国家认识的发展 (97)

1 绝对主义体制的动摇	(97)
-------------------	------

2 对近代国家认识的发展	(100)
--------------------	-------

三 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 (106)

1 政府内部健全国家制度的活动	(106)
-----------------------	-------

2	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开设	(108)
3	民权运动的发展与对近代国家认识的加深	(110)
四	向近代国家的过渡	(116)
1	政府方面的政策	(116)
2	明治 14 年政治变动前后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118)
3	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成立	(124)
五	中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126)
1	变法运动以前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126)
2	变法运动与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128)
3	以日本为楷范	(134)
	结束语	(139)

19 世纪后半期日中两国的振兴产业政策	(142)
前言	(142)
一 19 世纪后半期日中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143)
二 两国政权的比较	(144)
三 两国振兴产业的过程	(148)
1 军事工业	(149)
2 海运业	(150)
3 棉纺织业	(154)
四 关于买办	(165)
五 日本振兴产业政策的探讨	(171)
结束语	(175)

日中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文化形态的比较	(177)
一 日中两国近代化的比较	(177)
二 日中两国对外国文化的摄取	(179)
1 日中两国的对外关系	(181)

2	制造日本产品的愿望	(183)
三	文化的基本形态	(185)
1	日本文化的并存性	(186)
2	“并存型”文化产生的原因	(188)
四	摄取文化的形态	(191)
五	社会的协作关系	(193)
1	非亲族协作型社会	(193)
2	非亲族协作型社会的产生	(195)
3	“忠”与“孝”	(198)
4	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与血统制	(200)
六	教育的形态	(202)
1	日本教育的普及	(202)
2	江户时代初等教育普及的原因	(206)
3	“普及、提高能力型”的教育与社会	(208)
4	日本教育中“普及、提高能力型”形成的原因	(211)
5	科举与“选拔、达到目的型”的教育	(213)
后 记		(217)

关于亚洲近代化的笔记

(代 序)

一 前 言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如何理解明治维新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所谓“资本主义论争”中提出来的。这次论争不仅对历史学,对以后日本整个社会科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以后的研究虽然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加深了精细度,但当时所提出的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未得出结论。

在 30 年代的论争中,参加《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人们(讲座派)认为明治维新的本质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绝对主义的成立,明治 22(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通过是绝对主义的确立。他们的观点的出发点是:当时日本的当前社会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将迅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反,参加《劳农》杂志的人们(劳农派)则认为明治维新的本质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当前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论争本身就是这样围绕着当时的“当前的革命性质”而提出来的。但在如何理解近代日本的本质的方面,包括并

不研究革命问题的人们在内,都是当作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接受的,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围绕日本的近代国家的性质展开了上述论争的原因是:当时的日本虽然拥有已达到垄断资本阶段的发达的工业,但在政治形态、农地关系等方面仍然残留着许多与欧美各国不同的、被认为是“前近代的”因素,特别是战前日本农地的60%是处在地主佃农制的下面。在地主佃农制下,大多情况要收夺收获物的50—60%的实物,而且基本上不承认近代农业制度所特有的租地人的权利。讲座派认为地主佃农制的本质基本上是封建的,劳农派则认为是“变形的资本主义”。

关于日本战前的国家性质之所以存在以上不同的见解,其原因除了其复杂性外,还由于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与欧洲近代国家的成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最早成立近代国家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以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势力进行的,资产阶级势力掌握了政权。而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但采取的形式与西欧的资产阶级有着极大的差异。不论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或是在其后不久的当权者当中,都很难看到在西欧出现的那种“市民阶级”。

由于以上的原因,围绕着日本的近代国家的成立及其本质而展开了长期的论争。笔者对这些问题有以下的看法:

(1)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成立作为出发点。亚洲的近代化也是作为这种发展的一环而进行的,其契机是通过开放港口而被编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2) 亚洲近代化的动力是土地革命,在当时的东亚一带,基本上是通过土地革命而出现近代化的动向(如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

(3) 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在前期是以官营工厂和半官半

民工厂为中心推行的,这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政策基本相同,都带有前近代的性质。但在日本,主要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以及政府方面对试行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有所反省,因而在殖产兴业的后期把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抛售给了民间。这是“从上而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4) 明治维新建立了绝对主义。与此同时,幕府末期至自由民权时期存在的革命形势虽然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但通过波拿巴主义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点上,应当重视“明治 14 年的政治变动”。另外,明治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体制的本质并不是绝对主义的确立,而是波拿巴主义的成立。

(5) 由于明治宪法体制的建立,日本总算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但仍遗留下民主革命的课题。另外,以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迅速发展为背景,在大正时期出现了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过渡发展的动向,但在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潮流中,却向法西斯体制发展了,因而战前的日本始终存在着民主革命的课题。

笔者认为明治维新虽是通向日本近代化的出发点,但在这一阶段并没有解决近代国家成立的一切问题,日本近代国家成立的问题还必须包括自由民权时期来加以考察。

在认为战前的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这一点上,可以说笔者是继承了旧讲座派所提出的观点。但在以下两点上,对前面所述的两派的观点持批判的态度:

(1)

日本当前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回避了对当时的天皇制的斗争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另外认为战前的地主佃农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2)

前的地主佃农制的本质基本上是封建的。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有功绩的，但他们的观点无法说明明治时期及其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接受旧讲座派主张的人们的观点也不一样，有的认为通过明治宪法而确立的绝对主义体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也有的认为在某个一定时期发生了变化。但前者等于是把日本近代社会看成僵硬的毫无变化的社会；后者并未说清什么时候、怎样发生了变化，那就等于说日本绝对主义国家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笔者把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立放在明治 14 年政治变动至明治宪法通过这一时期。理由是这一时期有着这样三件重大的事实：(1) 革命形势的高涨；(2) 政治上的变革(公布宪法、开设国会)；(3) 经济上的变革(把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抛售给民间，培育民间企业)。在战前的任何时期都没有象这一时期这样集中地进行了这样的重要的变革。

二 亚洲近代化变革的形态 ——太平天国革命与明治维新

在考虑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等亚洲的一系列争取近代化的运动时，需要首先探讨一下这些运动采取了什么形态的问题。

即把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等西欧的变革当作“典型”，并试图以此为标准来考虑问题。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资本主义“强国”，日本长时期学习这些国家，并极力想赶上这些国家。这种倾向不仅在统治者方面有，就是在有志于变革的人

们当中也表现了出来。因此，在历史学的领域里也产生了这样浓厚的倾向：首先把这些国家的历史过程当作“典型”，试图把其中出现的现象当作尺度来衡量其他国家（也包括日本）的历史。战后对这种方法虽曾多次作过反省，但未能找出可以代替它的恰当的尺度，所以总的来说，仍旧漠然地袭用旧的尺度。历来关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观点之所以仍然并行不悖，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在试图把西欧近代化的过程当作典型而硬套其他地区的历史的方法中，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上是市民革命。当然，在战前、战后涉及西方史的这一问题的著作中，也强调了农民的作用。但就整体来看，不可否认在研究者的内心深处仍然潜藏着资产阶级革命就是革命市民的影子。其实西欧的自治城市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发达，市民阶级已经勃兴。东方地区与此不同，这样的阶层在社会上并未形成强大的势力，近代的变革当然要采取不同的形式。如何说明这样的历史过程，以前虽曾作过种种的尝试，但还不能说已经很充分。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仅靠西欧的事例是不够的，还必须连同以后的几个地区的事例一并加以考察。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重视列宁的有关 1905 年俄国革命的各篇论文。列宁在这些论文中规定“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关于当时的俄国革命，列宁这么说：“这次转变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群众性的罢工。俄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关于 1905 年的革命的报告》)

这些论文提出了许多问题。就是说，即使从“社会的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定采取市民革命的形态；另外，即使像 1905 年当时的俄国那样，在拥有相当程度成长和组织起来的无产

阶级的情况下,从“ 社会内容 ”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也可能采取“ 无产阶级革命的形态 ”;而且即使采取这样的形态,只要它“ 不超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 ”,那它仍然是“ 资产阶级革命 ”。

假定如上所述,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有几种形态,那么,谈到东亚是什么形态时将会出现下面值得讨论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根据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事例,认为它是“ 土地革命的形态 ”或“ 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形态 ”。时代稍后的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即所谓东学农民战争)也可以列入这一形态。

首先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其所发生的国家已被编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发生的。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与这些国家过去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性质。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是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其基本纲领。这个制度由于接连不断的战斗而未能完全实行,但作为纲领的意义是巨大的。太平天国后来在它的基础上,提出了见于《资政新篇》中的那些具体的政策。《资政新篇》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主要点还是要开辟轮船、火车等全国的交通网,奖励开发产业,设置金融机构和邮政、报道机构等。这里所指出的道路正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但它表明了亚洲的近代变革的形态是通过土地革命的形态,在这一点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形态获得继承,由孙中山的“ 耕者有其田 ”,发展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终于迎来了1949年的新中国的成立。太平天国革命即使能胜利,也不可能想像在当时能直接成立近代国家,但产生近代国家的前提——统一国家起码是可能的。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就明治维新来说,维新时期人民斗争的底流有着要求土地革命的活动。笔者认为,以前学术界一直争论

的维新时期“改变世道”的本质也是土地革命。也就是说,“改变世道”论指出了农民斗争在维新阶段由“百姓斗争”的阶段向以“改变世道”为中心的斗争过渡,笔者认为指出这种现象是正确的,但其本质应当看作是一种土地革命的活动。日本在维新时期的土地革命的要求,包括要求否定领主土地所有(要求否定贡租,或要求大幅度降低贡租,事实上等于否定了贡租)和否定地主土地所有(要求归还典押的土地和押死的土地)两个方面,其基本内容都是“把土地交还耕种农民”。

在日本的幕府末期,农民斗争和城市贫民的斗争高涨,这些斗争特别集中在幕府倒台的前后,形成全国性的起义。幕府末期的人民斗争与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的不同之点是,日本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的全国性的统一的司令部、纲领和自己独立的军队。其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幕藩体制这一封建统治组织拥有进行分割统治的机构。因此,必须要把当时各地发生的农民斗争所提出的要求集中起来,研究当时的农民斗争总的究竟有什么样的要求。笔者认为,幕府末期的农民斗争在其底流也是有着土地革命的要求,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各种资产阶级变革的要求。土地革命的要求是以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否定向领主缴纳贡租、向地主缴纳佃租,以及要求大幅度减少贡租、佃租事实上否定贡租、佃租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他的要求广泛地涉及到要求自由栽培农作物,自由贩卖农产品和营业自由,以及废除庄屋组织等封建统治机构和村落机构等。在幕府垮台期间所发生的“会津的改变世道”斗争,人们高度地评价它是几乎全面包含着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一次伟大

德川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农民斗争提出的口号主要是“改变世道”。故这一时期的农民斗争,往往称作“改变世道”斗争。——译注

德川幕府中后期:由村吏领导的反抗领主的农民斗争。——译注

德川幕府时期的村吏之长,由领主任命有名望的富裕农民担任,统管一村或数村的纳税等事务。——译注

的农民斗争。

信州佐久郡八幡村的农民依田铁之助在明治维新时期曾参加赤报队，后来又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他在地租改正的前夕曾起草过一个以土地的国有和均分为中心的土地革命的建议书。这说明了土地革命是幕府末期和维新时期的农民斗争的动力。

可以认为，日本争取近代化的斗争的基本形态，在一定的阶段也是以土地革命为底流的形态。列宁在其《农业纲领》这部著作中说，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彻底的要求”。笔者认为，在19世纪的亚洲，通过土地革命的形态是近代变改的基础。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近代的变革有以下三种基本形态：

(1) 像西欧那样以市民势力的成长为前提的市民革命的形态。

(2) 像1905年当时的俄国那样，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的和组织的成长为前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形态。

(3) 像19世纪后期的亚洲所出现的那种土地革命的形态。

笔者在前面说过，近代变革的亚洲形态是土地革命的形态。这必然导致农民斗争的力量将成为变革的动力的结论。这样，我想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么，它与封建社会里的一般的农民斗争有哪些不同呢？”是的，必须要区别“包含在事物本质之中的矛盾”——即作为封建社会本来的阶级对立的因素的农民斗争与作为导致“旧事物的消灭与新事物诞生”的因素的农民斗争。笔者认为，从前者向后者过渡需要通过一定的客观条件的成立才能进行，而其契机就是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

马克思在其很多著作中都谈过，资本主义成立的前提是世界

明治维新时期，各地的所谓忧国志士、富农、富商等组成军事力量，统称为“草莽队”。其中著名的为赤报队。后被明治新政权所镇压。——译注

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是以美洲的发现与非洲南端的回航为契机而获得发展,旧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新的市场的需要,在这样的状况下,使得封建的同业公会性质的手工业向作坊手工业乃至机械生产工业发展;打倒封建统治正是以这种变化为前提而进行的。从这一点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都是在其发生的国家被编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发生的。

马克思还在 1850 年 1 月写的《国际评述》及 1858 年 10 月致恩格斯的书简中说,资本主义为了其生存,不得不争取世界市场的形成,并说当时世界市场正在东亚形成。由此表明,当时的东亚所处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这部著作并不是只谈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这篇论文中,把“16 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17 世纪的英国革命、18 世纪的法国革命”称作“资产阶级的三次大起义”,并说 16 世纪的德国有可能通过这些运动而进行资产阶级的变革,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尽管当时已可环航好望角,但世界贸易的主要通路仍然要经过德国。

如上所述,19 世纪后半期亚洲所面临的形势是与近代的变革相联系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表示了极大的关心。马克思在 1850 年所写的《国际评述》中注意到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人民斗争的激化;并用极其谨慎的语言指出,这些动向可能会导致“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结果。从这些点可以了解,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部分的国家,该国的人民斗争已由单纯的封建社会所特有的阶级对立的表现,逐渐具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一与以前不同的新的意义。所以笔者把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之后所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明治维新、甲午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斗争与

在此以前的农民斗争区别开来。

恩格斯举出“德国农民战争”与以前的农民起义有区别的另一个要点是有“无产阶级因素”的参加。在这一点上,笔者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中矿山工人与城市贫民的作用,以及在明治维新时期的人民斗争中,与农民起义同时发生的城市贫民的暴动所起的巨大作用。

以上论述了亚洲的近代变革的本质及形态。

三 明治维新

上面已经论述了亚洲的近代变革与西欧的相异点。但亚洲的三个例子作为革命本身来说都失败了,太平天国革命不消说,就拿明治维新的运动来说,仅就以人民斗争为中心的观点来看,也是属于失败的例子。笔者在前面已经指出,明治维新时期的人民斗争与太平天国革命的相异点是在于没有统一的司令部、纲领及自己的独立的军队。但我认为这种萌芽还是有的。我认为在幕府倒台后不久一度发展成相当大势力的赤报队的运动就是这种萌芽,就是不以藩为主体的人民自己独立的司令部和自己独立的军队的萌芽。这个运动被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当作“伪官军”彻底消灭了,这表明它的存在对新政府是多么的危险。

不过,重要的一点是,与作为旧政府的清朝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最后没有崩溃相比,明治维新的情况是作为旧政府的幕府总算垮台了。其原因是当时的欧美的干涉势力使尽一切力量来扼杀太平天国革命和维护清朝政府的存在,日本乘着这个空隙而实现了推翻幕府。旧政府的垮台给以后的日本带来了与中国相异和实现近代化更多的可能性,但在当时也不可能立即产生资产阶级国家。日本拥有分割的统治组织,在幕府末期的矛盾激化中,是以反对幕府的几个藩(其核心是萨摩、长州二藩的联合)的形式展开了讨幕

运动。接着在藩政府垮台后,以萨、长二藩为核心的雄藩联合的形式产生了新政权。这些藩的实权虽然已由旧门阀阶层转移到下级武士的手中,但不能立即规定这样产生的雄藩联合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不过,旧政权幕府垮台,产生了作为近代国家前提的统一国家,其意义是重大的。这是以后日本社会变化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1868年(明治元年)新成立的政府是雄藩联合政权。但当时日本国内外的形势不可能允许这个政权长期存在下去。在维新时期内战的过程中,参加内战的各藩,包括取得了胜利的藩,都陷入了极度的财政困难,难以继续存在下去。特别是各藩购买的军舰已成为它们极大的财政负担。在幕府末期,各藩的旧的门阀秩序已经面临崩溃,在内战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崩溃。不过,促进藩解体的最大原因还是幕府末期以来连续不断发生的人民斗争。在幕府倒台的前夕,激烈的农民斗争是幕府垮台的重要原因,但农民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事组织还在萌芽时期就被遭到摧残,容许了雄藩联合的新政权的成立。可是,农民斗争在新政权成立后仍然不断激化,如最大的藩——加贺藩的“蓑衣暴动”和新政府直辖地飞弹的“梅村暴动”等大规模的斗争,事实上已经摧毁了各地的统治机构。当松代藩等所在地的北信一带被卷入农民斗争时,新政府曾考虑废除该藩,这表明旧的统治机构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新政府的实权人物之一的大隈重信在向政府提出的建议书《全国一致之论议》中说,分散的军事机构和统治机构已不能举办实事,其解决的办法是,“使各管之兵统属于

明治初年在富山县新川郡一带爆发的一次“改变世道”的农民起义。——译注

明治初年飞弹地方反对县知县梅村速水的人民起义。起义被镇压,梅村速水也被明治政府革职。——译注